

## 致友人《中华读书报》

■王以培

我还在旅途中,正走到重庆万州的太阳溪;眼前就是长江,一艘小白船正穿过雨雾,从青灰色的江面缓缓驶过;这是人间四月,一江春水碧绿如玉;我一个人坐在临江的小房间里写这篇小文章,就像在给老朋友写封信。

先汇报一下我最新的收获:太阳溪为什么叫太阳溪?当地老人告诉我,因为当年溪水里有一块太阳形的岩石。而太阳溪还有一景,叫“双狮跳楼门”,是指溪水边一对天然形成的石狮子,正对着对岸一座门形的岩石。可惜三峡涨水,这些全都给淹没了。

我之所以说这些,并非题外话。这些年我随心所欲,走走停停,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一切全凭兴趣。而这样的走法和写法,还能在现实中得到一点儿回声,实属幸运。

而现实对我是什么样子的呢?我想还是借一位三峡老人的话说——从前在白帝城下,奉节人民广场,有一辆普法宣传车在宣扬移民政策;车转来转去,高音喇叭响个不停;一位记者随机采访一位老人家,问他对此有何感想,他说:“你们法很多,我们没法儿。”

这里我并无否定移民法及宣传车之意,只是借用这位三峡老人的话,表达自己这些年在现实中的真实处境。

我只是一名普通教师,只想好好教书育人,在文学历史上,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可谈何容易?——“你们法儿很多,我们没法儿。”

没法儿怎么办,就只有漂泊、逃离,在孤独旅程中,有话跟

谁说?——“幽事欲论谁共?白鹤飞来似可,忽去复何如。”每每在这种孤单时刻,想倾诉心中幽事,就会给《中华读书报》写一些小文章。

起初,《中华读书报》刚刚创刊时,我大约还是一名苦闷青年;看读书报,就感觉自己有了一扇窗;正好有朋友约稿,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投了稿。

说起来也不怕人笑话,这些年,我无论创作或写文章,发表是意外,被拒或石沉大海,实属正常,包括这篇小文章也是如此。常年的创作和实践经验,早已让我对现实和自身的处境都有了一个相对清醒的认识,因此,我也从不抱怨。可是回想这二十年来,竟然有一位朋友在身后默默支持鼓励我,一次次给我意外的惊喜,这里我不能不由衷地说声感谢!

记得2000年前后,我在巴黎游学,感觉脱离了母语的环境,很不适应——“连雨滴和鸟都在说法语。”而我随身只带了一套《红楼梦》就成了我“日用的饮食”;每天读一回,获得了好大的安慰,就好像第一次读懂了“红楼”,切身体会到一部优秀作品,如何在时隔数百年,安慰一颗孤苦漂泊的灵魂。我于是写了一篇小文章,《在巴黎读“红楼”》,投给《中华读书报》,写完我就忘了,根本没抱什么希望。

而旅程中,我又去寻找法国诗人兰波,去他的故乡夏尔维尔给他这位诗人扫墓。此前,我刚翻译他的作品全集。我感觉兰波至今仍很孤单,人们都赞美他的才华,说他“如流星横空出世”,可对于他诗中与生命中所承受的绝望与苦难,却少有人问津;尤其是他日后“放弃文学”,独自生活在

非洲沙漠,承受着可怕的孤独与病痛折磨,直至惨死在归途中……在自身漂泊的日子里,我更深地体会到当年兰波的孤独与艰辛,于是接连写了一些对兰波和兰波诗歌的感悟和体会,如《E与山》、《蝴蝶的翅膀》,尤其是最后一篇《兰波的荒野》……我以为兰波日后并没有放弃文学,相反在无形之中孤注一掷,在以生命为自己心目中的诗歌与文学做了最详实有力的注解。

回国之后,我爱国心切,又去投奔我新成立的国学院,不想被一位大红学家拒之门外。我自知才疏学浅,又是学外语出身,人家拒绝自然有人的道理,只是自己仍心有不甘,于是又继续读“红楼”,进而发现,宝玉才是正宗“滚石”,天下第一;而那些“滚石”和摇滚青年只是宝玉的晚辈或小学生,并且一个个的不得真传——光会闹腾,不懂得“滚石”与“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真谛;不知从大荒山滚落人间温柔乡的真正含义和处境。我终于发现,宝玉表面逆来顺受,而骨子里却是最坚决彻底的反抗者——真正的反抗未必是沙哑的嗓音,也不必撕心裂肺;相反可以“勇于不敢”,并温润如玉。我由此又写了一篇小文章《滚石与“红楼”》,投给读书报。

后来我走投无路,又只身来到三峡,记录淹没区的传说历史和现实命运。我这才发现,长江边的神话故事与古希腊神话有着惊人的相似和默契:比如,根据这里的传说,风先水见真地,就要瞎眼睛;这与俄狄浦斯猜出“人”之谜底,发现真谛并刺瞎自己的双眼流落荒野,应该不也是一种巧合。我于是满心欢喜地写了篇论文,投

给“核心期刊”,结果不出所料,石沉大海。在等了几年没有回音,我又转投《中华读书报》,而这就是那篇小文章《再睹子与俄狄浦斯》的来历。

而就在此时此刻,我仍置身于长江边,在背离“学术”旁门左道上,越走越远,但良知告诉我:你必须走下去。何况一江春水在身时祝福我,用她的波纹在背上刻下暗语。有这么一瞬间,我甚至感觉自己像一只乌龟,驮着千年残碑,在江岸废墟间艰难爬行。

可是,在这里我要说的不是这些,而是简而言之,一句话,一首诗。

这句话是:想不到我前面提到的所有小文章,所有不成熟的想法,孤单旅途中的一些真实感受,都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得到了老朋友《中华读书报》的认可;所有这些文章,连同近期我与读书报的朋友,关于行走淹没区,“描绘长江边的古镇地图”的一次对话,也都发表了。而所有这些,真正是一个孤单的旅人,在茫茫的大地上听见回音,收到朋友的回信一样。有诗为证:

致友人《中华读书报》  
一面墙,一张纸;/跟你说话,总是在很久以后听见回音。/回音回头,找到自己的来路和足迹——我看见你终成一幅壁画;/我在画中旅行,牵着石人石马,/或行吟泽畔,或深入荒漠人群。

征文  
我与中华读书报  
中华读书报创刊20周年纪念

在阳台上  
——谈路翎晚年的创作

■朱珩青

阳台上,居高望远,俯瞰远近的风景,了解着、欣赏着大地上人们的生活。

阳台上,来回踱步,遥想着当年的风貌,回忆朋友的交情,见到了曾消失,但还活跃在眼前的热情的燃烧。

阳台上,高兴地看着盆花。绿叶青翠,花儿绽放,心情也随之放散着美丽。

阳台上的功课完成后,路翎回到屋内,开始了每天的写作。上午两小时,下午继续两小时。然后到楼下取牛奶。晚上,吃完每天必吃的“冬眠灵”,就去睡觉。睡得如何,只有他自己知道。

从1983年到1993年(这之前扫地劳作),大约十年的时间,路翎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十年时间他创作了500多万字的作品,平均每天2000字。应当说,路翎晚年生活是很充实的。对了,1981年路翎与夫人余明英还去了一趟山东德州,参加中国“剧协”组织的深入生活活动,1984年作为作协“理事”,他还去开过作协第四届代表大会。他的晚年生活算是相当丰富的了。

但是很不幸的是他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作品,却多数不能刊用。他在想:我又错了吗?我已经改过来了啊。过去,我不断地批评着社会的不公,揭示着封建专制统治给人们造成的精神创伤,激发着生命的原始强力去战胜它,使人的生命成长起来。解放了,我知道过去的东西没用了,所以,我努力地发掘着人民的优秀品质,歌颂着人民的伟大力量。但是我也知道旧的创伤不是一天可以清除的,所以我也在批评着人们的缺点(少量的),但是这也还是遭到了批判,像我的《洼地上的“战役”》。人怎么能都是完美无缺的,有点小缺点正常嘛。这怎么能是“反党、反人民”了呢?

阳台上的路翎“苦痛地走来又走回去,找寻什么样的路”(引自路翎诗《丧失者》)。

路翎责备起自己来:不是已经“平反”了吗,你还唠唠叨叨什么呢?此时,他又突然想起他在1954年写过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是啊,为什么会毫无根据的批评?而且随便就把人抓起来,投入监狱?一投就是20年?我未来的道路在哪里?路翎还在阳台上,他的“沉重的心和血液如同干燥的铅块,火焰熄灭着的心脏痛苦”(引自路翎诗《失败者》)。

不过,经过了痛苦后的反省,路翎又渐渐振作起来:为了新中国的更快前进,我还是要歌颂,更多地歌颂。

在诗《城市和乡村的边缘的律动》中,路翎歌唱道:“晴朗和阴雨,中国共产党推进的生活沸腾着。”在诗《阳光灿烂》中,他歌颂着:“社会主义灿烂光明,中国共产党牵引着生活前进。”

在1985年写的《野鸭洼》里,路翎直接塑造了一个空前光辉的英雄

形象:街道党委书记海国乔。他是中共20年代的地下工作者,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模。他全面负责街道的工作,还要管街道的养鱼池,还要组织街道缝纫厂办货运——除了这些每天8小时都难以办完的事,他每天还要天亮就起床和路翎一起扫地。每天都扫,一天不来,要派人顶替。

路翎在这里给我们创造了一个近乎神的形象。要知道20世纪20年代的地下党人,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不仅没有退休,每天还要做常人难以做到的事。路翎在《野鸭洼》这篇小说的开头这样写道:“这是稳定的时代,这是平常而又英雄的时代,这是创造的时代。因为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在这时期清除了‘四人帮’的劫难,又走上了康庄大道——为了跟上这个英雄的时代,创造的时代,路翎一直在努力。不过,他的创作仍然不顺。”

路翎仍在阳台上,他“寂寞地枯坐”“引自路翎散文《忆阿垅》”。他在感受着“事业失败、生活挫败者沿着朦胧,似乎变异的路归来,来到阳台上,凝望命运了”。他在盼望着“什么时候一切丧失的正直者都归来”(引自路翎诗《丧失者》)。

总之,那位“像吸盘一样吸住生活”(胡风语)的路翎已经不存在,他就那阳台上的盆花,已经离开了生养他的大地,靠一厢情愿的想像工作,当然没有多少生命力了啊!

年轻时四处奔走,深入矿区,深入农村,与最底层的人共呼吸,共命运的路翎哪里去了?他真的不想更多的去接触生活吗?因为身体欠佳?据他的家人说他晚年常患脚气。不过,这只能是一部分原因吧。我们在他晚年描写扫地的创作中,时见这样的细节:各类人都在谈论着他的身份:“革命”、“反革命”?

“作家”、“扫地”?不仅谈论,有时还当面质问,以至争论。真有点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似的,那是多么难堪的局面啊!自尊的路翎怎么忍受得了?他无奈地选择了“阳台上”的挣扎,总之,路翎已经失去了正常人的生活状况。一个被中国丰润的大地哺育起来的作家,渐渐地干枯了。多么地凄凉!

总之,这个阳台上的路翎已经不是原来的路翎了。不过,他的回忆文章却绽放着年轻的光彩。像《忆阿垅》《一起共患难的友人和导师——我与胡风》等等。

尽管如此,路翎还是希望与更多的人交往,与生活联通。他在《错案20徒刑期满后,我当扫地的工中》,不断地写着,上班的工人经过他扫地的地方,招呼他,去赶火车的人,上学的学生,以至还有女飞行员向他好。其实,当年他扫地的芳草地乃城市的边缘,只有少量的简易住宅,一所学校。往东走是一片荒芜的湖洼,叫“野鸭洼”。湖边是坟地,荒草。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多人经过,尤其是“女飞行员”。

路翎在阳台上痛苦着,也希望着。

## 日记·书信·序跋

■张瑞田

刚刚离开我们的来新夏教授提倡日记体散文,他说,日记体文章是传统的随笔,自如、本色、真情,故希望更多的人写日记,不管是简笔记事,还是抒情遣怀,都是当代不可或缺的文字内容。

我的阅读生活,很多时候是阅读古今文人的日记、书信、序跋。我觉得传统手札或现代书信,是有历史依据的文体,与日记一样,不雕饰,不虚情,也不容易被工具化,如果以古法写作,并借助毛笔书之,书香味浓烈,情调更为高致。从广泛的文化层面上审视,序跋也是高度民族化的文体,尤其是宋明清的文言序跋,短小意深,读起来如饮佳酿,回味无穷。这些文字富含人生哲理,具有生活趣味,文字有节奏感,含蓄、隽永,提供的想象空间非常辽阔。近读黄君《书法·文化·哲学:黄君随笔短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如见一条灌溉心田的淙淙小溪,清新之风拂面而来。

黄君是当代一位有古风的书法家、学者、诗人。作为二王书系的代表性书家,他的草书被视为当代书坛重要的存在。与此同时,他在黄庭坚研究、佛学研究、诗词创作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这种学养积淀和文学修养,赋予他的日记、书信、序跋深厚的文化涵义。他在日记

## 旧体诗的生命力

■肖复兴

延福、博文、俊成、建国,最近自编自印一本诗集《兄弟诗》。他们和我是一中学的同班同学,迄今已经有五十一年的友情历史。几位老友,既是同学,又是同好,中学时代就喜好写旧体诗,前几年退休之后,更是重拾旧好,经常写诗往来,唱和应答,相互切磋。博文有诗:“老头几个伸脖唱,语不惊人死不休”,旧体诗成为生活一大乐事。

我们彼此的经历相似,中学同窗、文革、插队、返城……日子不经过,一晃垂垂老矣。所以,读这四位老友的诗,分外亲切,因为那那里有我们共同经历和情感的,曾经那样熟悉的情景,都抽丝成茧,化作了诗。想起已故老作家萧军曾说:“只有旧体诗,才和自己有着血肉关联。”信是不假。

过去写诗的生活,成为了这本诗集咏叹的重要篇章。“解馋猪头肉,初恋杨柳枝”;“窗外忠字舞,田头对口词”;“溪水濯衣碱,椒油拌萝卜,散步谈心语,球赛争入篮”;“石走沙飞地欲翻,紧接鬓颈恐冲天,马头硬往怀里钻,戛然

风定云可摘,晶冰絮雪扑面来,羊群顿陷梨花白”……这些浸透着情感的诗句,成为了大家共同的回忆,不仔细辨别,几乎看不出究竟是谁写的了。那些让青春苍老凄惶的回忆,被大家裁诗叙心,百感交集。

这本诗集,最让我感兴趣的,并不在这些杂糅复杂情感的青春回忆方面,而在于对日常生活,特别是退休之后,人渐入老境的生存状态与心理谱线的描摹和抒发。这使得这本诗集没有沾惹如今旧体诗中常见的那种空泛的“老干部体”之风,而多了浓郁的烟火气,和真切的心情律动。

看建国退休之后出门遭大雨,索性唱一曲雨中行:“风卷护披裤湿透,车冲积水浪翻腾,回味遭淋荒野景,而今窃笑老顽童。”将现实与回忆交织,将心情和情景相融,是一种老不服老的自得和自慰,是建国的性格。看延福新开博客的新情新景:“一窗小景收冬寒,半亩闲田种豆瓜,欲会友朋登博客,扑来音讯眼迷花。”比喻得那么贴切,写得又是那么情味四溢。延福写他老来得孙之喜:“白头顶顶丝飘雪,愿暖冬时春入阁,夜半嗷嗷急抱起,腰疼一阵又如何”;“外孙长牙我掉牙,双口洞开

笑直发,学语难知爪国语,争食随见满脸花”。前者比兴写意开头,切入具体写实收尾;后者白描生活即景,直抒胸臆,情趣盎然。

写得更好的,是俊成和博文。俊成诗:“体弱药煎回春酒,寿长足泡不老汤,练身林苑舞太极,找乐琴房唱昆腔。”将自己的日常生活状态和达观的心理表现,抒发得淋漓尽致。难得的是,他不是把生活单摆浮搁地端出来,而是进行了诗化的剪裁,昆腔和太极,练身和找乐,回春酒和不老汤,这些日常生活常见的景物,才变得有了对仗的情趣,有了诗意,有了我们会心会意的共鸣。

博文有一首题为《习书自得》:“皓首学书为乐和,写诗写好又如何。有心砺刃雕狗马,无意挥毫画龙蛇。宁被斯文骂山寨,莫装豪放笑篱笆。每逢笔到得意处,不待铃呼老婆。”这首诗写他的生活实情实景,却虚实交加,有情,有感悟,有书中自得,也有言外之意,更有他生性的桀骜性格的流露。最后一联:“每逢笔到得意处,不待铃呼老婆”,多么潇洒,颇有魏晋之风。

博文还有一首题为《街头即景》:“天下有人管,自家不能离。买

书学炒菜,拎米看棋。牵狗压马路,听人吹牛皮。老婆凭窗唤,该管孙学习。”写得风趣俏皮,特别是“牵狗压马路,听人吹牛皮”一联,让我想起流沙河先生写的“狱中陈水扁,楼下赖汤圆”,忍俊不禁。能够将庸常场景和日常用语入诗,并对仗得如此巧妙工稳,是写诗的本事,更是生活的态度。

我赞赏这样的写法,旧体诗不应该体裁属于旧,就一定都写得风花雪月一样的旧,而是能够如他们一样将现实的日常生活入诗。这样才会让旧体诗焕发新的生命和新的韵味。近年来,旧体诗词重新复活,在聂绀弩、邵燕祥等老一辈作家的诗集一版再版的带动影响下,获得越来越多人的喜爱。最近诗人流沙河又尖锐地指出:新诗是一场失败的实验,而倡导回归旧体诗。都说明旧体诗的读者和作者在扩大,旧体诗的创作和现今生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从某种程度而言,旧体诗复兴的生命力,不居庙堂之高,而多处长江湖之远,属于草根民间。这本《兄弟诗》便说明了这一点,几位诗人,名不见经传,但他们的诗证明了,一点也不比眼下一些正儿八经写旧体诗的诗人差,甚至更值得一读。

## 听到你在就好

■路文彬

按照西方的礼仪,双方在做面对面的交流时,总该用眼睛直视着对方的眼睛才好。因为那是你尊重对方的表示,是你在认真聆听对方话语的证明。而华夏民族似乎没有这样的谈话礼仪,我们只是一味讲求洗耳恭听。为了这洗耳恭听,那听者常常是低着头,于是,自然也就无法直视对方的眼睛了。

后来,渐渐地便开始有人非议国人的这种说话习惯,拿他人的礼仪挑剔起自家的礼仪,弄得我们仿佛压根就不懂得谈话的礼节似的。其实,相比于西方,我们这个民族自古就是一个最善于倾听的民族。我们对“宁静致远”的崇尚,对“沉默是金”的信奉,所表达的无不是之于倾听的热爱。

说到本质,听觉的内涵是谦逊的;在拉丁语中,听的本身恰恰

就有着恭敬、顺从的意思。事实上,若是没有了这样谦逊的情感,听便只能沦为一种外在的形式,即使话语进入了我们的耳朵,它也仍旧难以抵达我们的心灵。总之,真正的倾听永远离不开谦恭的内心。

迎取对方声音的应该是我们的耳朵,而非我们的眼睛。此时此刻,我们的心灵之门正在向对方敞开,我们丝毫没有心不在焉。况且,话语交流过程当中那专注的眼神,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保证我们不散漫倾听时的注意力呢?

而就视觉来说,距离始终是需要的:太远看不清,太近看不清。就因为这距离的存在,招惹得那惯用眼睛的西方人只好借助亲吻和拥抱来弥合彼此身体之间的隔阂。中国人既不喜欢亲吻,亦不喜欢拥抱,那是因为我们彼此的身体之间本来就没有这样的隔阂。要知道,听觉取消

距离,声音从一个人的口中直通另一个人的耳朵,随即触动其心弦,进而引发双方身体的共鸣和默契。不用亲吻,也不用拥抱,彼此便可感受到来自你身体的友爱和温暖。可见,亲吻和拥抱所象征的不能说不是一种热情的关系,但拒绝亲吻和拥抱却也并非就是在刻意传达着某种冷漠。

我们的误解源于我们的无知,倘若我们能深深领会听觉的真谛,还有我们那根深蒂固的倾听习性,我们便不难明白,在听取对方的讲话时,我们确实是不愿盯着对方的眼睛或面孔的。毕竟,听觉的谦逊与专注造就了我们高度敏感的心性;而视觉在本质上又是富有好奇与急切的进攻性的,故此,我们注定不好意思将这种目光直对他人的眼睛和面孔。我们与生俱来的腴腆以及含蓄,实际上恰是同我们的这种视听习惯息息相关。所谓的羞感,也只能在这种倾听的过程中